

“延安五老”的崇高风范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即分别称谓徐老、吴老、谢老、董老、林老。

“延安五老”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早在1933年中央苏区根据地时，他们就担任了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工作。1934年10月，除了吴玉章同志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参加了长征。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们五位继续担任了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以雪鬓霜鬟朝气蓬勃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徐特立：“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财产”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生于湖南长沙。1927年夏秋之际，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之时，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地激励了共产党人的士气。1934年10月，徐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徐老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从不因为年纪大、地位高、贡献大而居功自傲，搞特殊。1957年1月，徐老去长沙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关领导建议说：“您老都八十高龄了，为了您的健康，小组会就不用参加了。”徐老却说：“我这次回来，正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好机会，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仍能听、能记、能思考，回京以后还要整理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不参加会议怎能行！”

谢觉哉：“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谢觉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已经50多岁的谢老，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谢老，盛气凌人地对他说：“根据某某人的交代，他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谢老听了毫不含糊地反驳道：“那可不见得。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局派去的同志组成的，省委书记孙作宾同志也是西北派去的，怎么能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全都是特务呢？”谢老略顿了一下又说，“至于有个坏人混进兰州地下党，这也是可能的，因为那是在白区，条件所限，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审查得那么透

彻。”谢老最后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这样认为是不对的。”可是康生一伙仍不罢休，一会儿来软的，说这是为了“抢救”失足者；一会儿又来硬的，说谢老在庇护特务组织。谢老也毫不退让，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文革”中，康生仍不罢休，又旧账重提，逼着谢老写材料，欲把兰州地下党的同志们都打成特务。当时谢老的处境也很困难，加上已80多岁的高龄，又重病在身。谢老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材料。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来调查的人以为目的即将得逞，赶紧找来纸和笔做记录。只听谢老斩钉截铁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务，而是好党员。”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这样，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林伯渠：“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深夜，林老从卫生队回来，看见警卫员小黄正往暖瓶里灌开水。他命令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去，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小黄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将暖瓶送到了卫生队。

1944年春节，延安边区政府门前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一个高个

吴玉章：“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老深感对干部加强革命气节教育的必要性，于是把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他还为大家作演讲，讲到激情处，声泪俱下，听者为之动容。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吴老闻讯披衣急起，正气凛然地呵斥国民党军警。随后几天，吴老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励斗志。他表示，他向党中央负责，向同志们负责，只要他活着，一定要使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

董必武：“争取当个好农民”

董必武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第四位，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盟会。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参加党的一大。

1935年，董老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虽为校长，他却将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爆发后，为了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的花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可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不超过半小时就行了。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这样不就准了嘛。”

董老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

子外国记者挤在人群里，认真地抄写着一篇题为《我的生产节约计划》的文章。原来，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的。林老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那位外国记者也很受感动，就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采访了林老。记者来到林老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张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此时，林老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外国记

延安。3月8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和一个连长同吴老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他到飞机场。当吴老看到只备有2架飞机时表示坚决不走。后经了解，另外几架飞机没到确系气候原因，次日即可到达。同志们也劝吴老不必担心。这样，他才上了飞机。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吴老在艰苦朴素的作风方面也为后人作出了表率。他在大革命时期用的一条毛毯、一个文件箱以及延安时期用过的一套呢呢衣服和一件羊皮袄，一直用到他去世。平时接待宾客，需要衣着整齐一些，而一回到家里，他总是只穿旧便服。他的内衣、袜子大多是补丁加补丁；一条毛巾用得实在无法再用了，仍舍不得更换。至于饮食更是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了。

钱共计2600多美元，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

董老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而自居，不谋私利，不搞特权。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仆耻为官”，他还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自勉。

董老对子女和亲戚也是严格要求。1969年春，为响应党的号召，董老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翻送到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在良翻下乡前，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个好农民。”1970年，董良翻入了党，后来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翻是晋县的人了，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者提出要看看他种的菜地，于是林老便拄着根手杖，带他来到了延河边的一块滩地上。外国记者蹲下身体，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赞不绝口：“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不仅发动群众干，还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他紧紧地握住林老的手说，“谢谢席先生！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据《天津日报》）

王冷斋与卢沟桥



“长虹万丈跨卢沟，胜地流传七百秋。桥上睡狮今渐醒，似知匕首已临头。”这是王冷斋组诗《卢沟桥事变纪事诗》中的一首。王冷斋何许人也？1937年7月7日，日军炮制“卢沟桥事变”时，王冷斋正是宛平县长，他用一组七言绝句记录下事变的始末与个人的心情。

若论卢沟石桥的历史，它已不止“流传七百秋”。早在战国时代，卢沟渡口即是通往华北平原的南北要津，曾有木桥架设在永定河上。金建中都（今北京）后，于大定廿九年（1189年）营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年）完工，距今已有828年历史，石桥完工时，它的名字还不是卢沟桥，而被称为广利桥。元代来华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述过卢沟石桥，以至在西方它被称为马可波罗桥。他盛赞卢沟石桥“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他也用“气贯如虹”来形容石桥。

在卢沟桥事变中，石桥上曾发生战斗。卢沟石桥桥头坐落着宛平

城。日军企图强力进入宛平城，中国军民奋力抵抗，日军未能强入。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第二天北平沦陷，驻守卢沟桥的军队也撤出了。王冷斋在诗中记录了自己的心情：“与城愧未共存亡，人庆更生我独伤。国步方艰应有待，此身终合向沙场。”诗后自作的小注中，王冷斋自述守城二十多天虽屡逢危难，但竟能不死，有人为此感到庆幸，而他却认为自己不能与城共存亡，实是不幸也。

王冷斋随军撤出后，在军中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局的看法。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同胞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王冷斋写下了《卢沟桥事变纪事诗》的最后一首：“延安奋臂起高呼，合力前驱原执爿。亿万人心同激愤，山河保障定无虞。”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妇女先驱沈兹九的一段办报历程

沈兹九（1898—1989），浙江德清县人。她是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及宣传教育部部长等职，主持妇女宣教工作，还担任《新中国妇女》（《中国妇女》前身）月刊的总编。

1932年夏天，沈兹九经朋友介绍进入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任《时事类编》助理编辑，翻译日本新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接受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的思想。1934年初，她结识《申报》总经理、开明人士史量才，就托人征询是否可以在《申报》开设一个妇女周刊。史量才慧眼识英才，随后决定将《自由谈》星期天的版面改为《妇女园地》，聘请沈兹九担任主编。

1934年2月18日，《妇女园地》第一期出刊。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在苏杭道上，几天后，“园地”就被压缩版面。沈兹九意识到，“园地”被禁是迟早的事，她要有所准备。

1935年春天某日，沈兹九邀请来的杜君慧、罗琼等上海妇女界的进步精英聚会，商讨开辟一个新的园地——《妇女生活》月刊。7月1日，《妇女生活》创刊号与读者见面了。

《妇女园地》于同年10月被勒令停刊。由于《妇女生活》连续报道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相关情况，发表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宣言》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等内容，一时上海24个刊物被禁，《妇女生活》也“荣登”榜上。

抗战全面爆发后，当局加强了图书杂志原稿的审查，《妇女生活》步履艰难。从创刊起，《妇女生活》经历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到全面抗战，刊物从上海迁到武汉，再迁移到重庆，其间经历的“劫难与苦斗”只有沈兹九自己最清楚。1940年，《妇女生活》改由他人主编，皖南事变后被查封。

（据《人民政协报》）

最后一期黄埔军校学生起义全过程

黄埔23期于1948年6月到7月间，在成都通过考试向各地招生，12月1日正式开学。这时解放战争的整个形势已经很清楚。

1949年9月初，黄埔军校三名有进步思想的军官，即黄埔三期学生、时任教育处陆军少将处长李永中、特种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陆军少将肖步鹏。他们与共产党西南工作组秘密取得联系，于9月8日悄悄地达成协议：即军校将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

1949年11月初，蒋介石第二次来军校。7日蒋介石召集军校全体官生讲了话，说要迁校，却没说清迁到哪里。这时李永中、肖平波准备扣押蒋介石后起义，但肖步鹏把计划预先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坐机仓皇逃走。接着张耀明、吴允周也坐机逃离成都。迁校事宜安排给李永中以代理教育长兼迁校行军总指挥的名义。11月中旬，全校开始行军南下。李、肖二人为实现“九·八协议”，采取了让、拖、等的办法。

12月军校继续北上至温江西，这时北面军校生已和解放军接上了头；西面是罗广文的一个军，已经宣布起义；东面是胡宗南三个兵团的国民党军。23日，时机终于等来。在温江西临时指挥部内，由李、肖二人召集各队队长和学生代表会议，

体彩开奖公告			
超级大乐透第20063期			
出球顺序 33-20-18-11-27-06-07			
开奖结果 17-18-20-21-33-06-07			
全国中奖情况			
奖级	中獎注数	每注金額	
一等奖	基本	3注	10000000元
	追加	2注	80000000元
二等奖	基本	48注	284622元
	追加	18注	227697元
三等奖	基本	174注	10000元
四等奖	基本	594注	3000元
五等奖	基本	12753注	300元
六等奖	基本	21464注	200元
七等奖	基本	30623注	100元
八等奖	基本	632386注	15元
九等奖	基本	6977081注	5元
合 计		0注	
本期奖池奖金:828120323.96元			

在清代以前，中举、入仕是每个读书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学生的目标，但是考试和试卷都和现在完全不同。这份清代光绪年间的试卷就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当年的试卷是什么样的：高25.5厘米，宽15.5厘米，共3页7面，竹纸。封面中间上端一长方框内竖排着“松林书院”四字，下方有一圆圈，再下有毛笔字迹：“益都贡贾邱端玉”，右侧竖排“第超等第二十八名”，其中“超”、“二十八”为毛笔手写，“二十八”用的是繁体写法。

试卷主人邱端玉字锦方，号星岩，清代益都（现青州）人，光绪八年举人。这份试卷就是邱端玉成为举人前，在青州府学松林书院的考卷。

试卷的内容是一篇八股文章，题目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试卷打有红色暗格，每行25字，每页9行，除去题目一行，共约911字。字迹比较工整，大多数字旁有圈点。

廩贡是什么功名呢？就是指府、州、县的廩生被选拔为贡生。



在明、清时期，举人考试为三年一科，正式的名称叫“乡试”，雅称为“乙科”，考上的即为举人。乡试的考场，称为贡院。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挑选出来的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初进学的秀才，称为附生，附生升廩生，廩生升岁贡生（含恩贡生），都必须经过岁试，依次递补。廩生出贡，有一年限，依序出贡的贡生，便称为“岁贡”。假如出贡的年份，朝廷恰有重大庆典或喜事，则这年

的岁贡，便称“恩贡”，恩贡有一项岁贡所无的特权，即非有重罪，学政不能呈请革去科名。正途出身的贡生，另有“拔贡”“优贡”“副贡”三种。正途五贡之外，又有“准贡”“廩贡”“增贡”“附贡”“例贡”等名目，都由捐纳而来，视其身份，而名目也不相同。

松林书院建于北宋仁宗年间，最初时因院内对植古松二株，干矮枝阔，故名“矮松园”。明正德年间，才更名“松林书院”，沿用至今。据《青

州史话》记载，宋仁宗曾御赐“矮松园”五经四书一宗，并诏示各州效仿青州，办儒学，以为朝廷造就人才。明宪宗成化五年，青州知府李昂将府治仪门之左的“名宦祠”，移建于矮松园，并改称“名贤祠”，以祭祀宋代13名德政显赫的青州知府，其中包括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政要文人。明正德十年，青州知府朱鉴又移“乡贤堂”于此，以祀王曾、石茂华等当地名士56人。

清光绪二十七年，清廷谕令“各省、府、州、县，大小学堂一律改为高等、中等、小学堂……”青州知府曹允源于次年将青州松林书院改为青州府官立小学堂。至民国三年又改名山东省第十中学，校园扩建到书院以外地域。教育总长蔡元培曾亲题“勤朴公勇”牌匾作为校训，高悬门上。

新中国成立后，再改名山东省立青州中学。此后数易其名。1986年，正式定名青州市第一中学。

（据《齐鲁晚报》）